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丛书主编 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安国楼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 与客家文化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丛书主编 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安国楼 张得水 张留见 王丽杰 著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指导顾问:吉炳轩(黑龙江省委)

指导顾问:连维良(洛阳市委) 张国祚(全国社科规划办)

陈义初(河南省政协) 杨光(国家教育部)

学术顾问:李学勤(清华大学) 汤一介(北京大学)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 李申(中国社科院)

顾问:郭洪昌(洛阳市政府) 杨祥麟(豫运台古物监委)

周宗良(洛阳市政协)

总主编:李学勤 赵金昭 史善刚

编委:(依姓氏笔画为序)

史善刚 安国楼 李晓敏 李焕有

杨祥麟 杨海中 杨晓塘 张得水

张留见 赵金昭 徐金星 梁锦瑞

黄黎星 扈耕田 程有为 温玉成

董延寿 鲁庆中 谢琳惠 薛瑞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安国楼等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15-07380-7

I. ①河… II. ①安… III. ①文化史—研究—河南省
②客家—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 IV. ①
K296.1②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7325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永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284千字 印数 1-4000册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丛书总序之一

这部《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共分六卷，共约 180 ~ 200 万言，撰写计划从 2006 年起实施，经过多位作者集体努力，现已如期成稿，即将付印问世，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丛书的创意设计，出自赵金昭、史善刚两位先生，他们也是全书的组织者。我由于长期与洛阳学术界有深厚因缘，厕名其间，实际没有什么贡献，这是必须在这里说明的。不过我一直认为“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这个题目很是重要，于丛书出版时写几句话以为推荐介绍，是我应该做的，也正是我的荣幸。

近年我写过几篇小文，参与有关河洛文化的讨论，还有若干序跋，从不同角度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回想起来，写这些文章的动因，都是鉴于国内区域文化研究的日见兴盛，觉得进一步推动河洛文化的探讨很有必要。如我几次谈过的，分区域地论说中国历史文化，固然是古已有之，然而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风气，却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学术界深入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多源的、多线的，从而各种区域文化进入历史学、考古学等学者的视野，不少还成为学术研讨的热门。尤其是中原以外，曾经在传统上受到忽视的地区，更成为这种研究的用武之地。所谓“中原中心论”的偏向，于是得以纠正。

然而这里还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忽略了中原地区同样有其区域文化，而且是特别重要的区域文化。记得在 1981 年，我为《中原文物丛谈》作序，便谈过：“中原地区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本为众所熟知，但中原和周围地区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从来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为国内各民族所共同创造。……关于中原以外地区文化的新认识，使我们不得不

考虑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究竟还能不能称为中国文明的摇篮?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各地的文化发展有了新的估计,必须认识到,中原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作用。这是由于当文明产生萌长的时期,中原地区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枢纽。”河洛是中原之核心,所以此处说的中原文化即是河洛文化。

现在大家都熟悉洛阳一带古时被称为“天下之中”了。这个观念的起源真是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在当地建都。周武王克殷之后,在选定新邑(即后来的成周)地址时,就是这么说的。周朝宗周、成周两都大势的奠定,成为后世长安、洛阳都邑传统的张本,于历史上意义之大,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到北宋,国都另已东移汴京,当时李格非(李清照的父亲)仍在《洛阳名园记》说:“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足见这一地区影响之长久深远。

中原地区与周围地区,中原文化(河洛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其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认为必须作动态的考察。我们讲的动态考察,大概说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要注意文化的不平衡性。各个地区的文化,总的来看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个或一些地区,有发展上超前于其他区域。比如说上面提到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原地区有其特殊的优越之处。

其次是文化的变迁性。文化演进流动不居,各个历史时期在其性质、特征等方面均有不同,不能简单化、公式化。尤其是当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口,变迁的迅速剧烈每每出人意外。

再有是文化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有彼此影响,而影响一般说不会是单向的。即使在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后进的文化区域也会对先进的区域产生影响,况且文化差异常常很难说是“后进、先进”。

总之,我们观察和研究像河洛文化这样的重要的区域文化,一定要注意到其在历史上的动态的关系。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正是这样。读者很容易看到,丛书中第三卷《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第四卷《河洛思想文化研究》和第六卷《河洛宗教文化与艺术》,对河洛文化的中心内涵进行综合的分析和探索;第一卷《河洛文化

与闽台文化》、第二卷《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还有第五卷《河洛文化的对外交往》，则对河洛文化的衍流与传播重点作出研究。几卷书虽出各家学者之手，却能互相配合呼应，相得益彰。

河洛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如何的重要作用，又怎样演进传播，影响广及全国各地，同时与境内外种种文化融合交流，还有许多深层问题有待今后探讨。希望这部丛书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取得更多更新的成绩。

李学勤

丛书总序之二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说它重要，不仅仅因为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条根脉，而且因为它把河洛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并进而把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河洛文化与寻根文化等有机地联系起来、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联系起来。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热切期盼。因此，把河洛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联系起来、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与民族和谐联系起来、与祖国统一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就这套研究丛书的基本内容，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河洛文化的传承问题

河洛文化的传承，既包括它在中原地区内的继承与发展，又包括它在中原地区以外的传播与演化。从历史上看，河洛文化对中原以外地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自秦汉以后，汉人逐渐南迁，南迁所到之处，比较集中的地方就是闽南和广东等地。由闽南渡海又来到了台湾。中原河洛移民从闽南到台湾，带着汉民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开发和建设了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并与当地的民族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闽台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但说到底，闽台文化与中原河洛文化是同根同源的。二者之间完全是一种血缘关系、宗亲关系和源流关系。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又是一种什么关系的呢？同样是一种宗亲关系、血缘关系和源流关系。所谓“客家”是相对于“祖亲”而言的。“祖亲文化”意指土生

土长、世代因袭繁衍的文化；“客家文化”则指迁徙而来、客居他乡带来的文化。就地域来说，闽台文化主要是指与福建和台湾区域特色相结合的河洛文化，而以河洛文化为母文化的广义客家文化则传播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如今的客家人，已遍布于亚洲、美洲、澳洲，以及欧、非洲等五大洲之内。不仅在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大国有客家人，而且中美洲的牙买加、千里达小島、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太平洋的斐济和大溪地等也居住着客家人。据统计，客家人在海外的总人数可达上千万之多。正是这些客家人，带着中原的河洛文化，又吸纳并融合当地的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的客家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外的客家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种国际形态。

河洛文化与寻根文化的关系，也是本丛书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寻根文化是指移民们在寻找自己的血统根脉、姓氏起源、先人始祖、家乡故土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由于河洛文化是海外客家人的文化根脉，所以，海外客家人自然会通过学习和研究河洛文化作为寻根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河洛文化是海外客家人的寻根文化，也因此，让河洛文化走向海外、走向世界，就有了极大的空间，深化和拓展河洛文化的研究将有利于凝聚海外华人的祖国向心力，有利于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关于河洛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又是居于什么地位的呢？对于此一问题，我们只有从历史上来作一深入考察才能给予回答。从近代的考古发现来看，从新石器时代中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大多数都集中于中原河洛地带。而同这一历史时期相对应的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此观之，河洛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率先进入到了文明时代。到了夏、商、周三代，而河洛文化又是处于什么地位的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唐人指的是唐尧、虞舜，殷人和周人则指的是殷商王朝和西周王朝。这里所说的三河，就是指河洛地带。从近代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确证了二里头文化乃河洛地带夏部族所创造的夏文化，是河洛物质文化遗存在夏代的集中体现；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安阳殷墟的发现、发掘及其数以万计的甲骨文的出现，都

有力地证明,殷商王朝从早期到晚期,皆把都城建在河洛地带的中心区域内。夏和商两个朝代在河洛大地上建起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国家。继夏商之后的是周。周公营建洛邑和制礼作乐,对整个周文化,乃至对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文化和制度,无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先秦诸子,如老子、庄子、墨子、商鞅、韩非、苏秦等等的河洛志士仁人们,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而开创了中华学术史上的辉煌时代。进入汉唐鼎盛时代之后,河洛地带又成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新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发祥地。河洛文化真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愧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第三,关于河洛易学文化的渊源问题

《易经》一书,在古代被认为是古经中的群经之首和三玄之冠;在现当代,又被视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端。作为易学文化的标志来讲就是《易经》,而研究和探讨《易经》的这一学问被称为易学。易学文化历时长达二、三千年之久。《易经》所诞生的时代及其地域,不论从地面文献资料,还是从地下文物资料,皆集中于殷周时代的河洛地带。那么《易经》的渊源又在哪儿?其时代和地域又如何辨析?有神话般的传说,又有文物资料的考证,可靠可信的释读又该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史善刚先生所主撰的《河洛文化与中国易学》卷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史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资料中,来论证和阐明这一问题的。这种研究《易经》的态度、思路和方法应予提倡。

第四,关于河洛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问题

河洛文化虽产生和形成于中原河洛地带,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外延,绝非囿于一个地域之内。它所涵盖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它所体现的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于河洛文化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该丛书把它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 刚健自强的“龙战”精神(英勇果敢);
2. 厚德载物的人道精神(宽厚善良);
3.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爱国精神(民族爱国);
4. 和谐统一、和睦相处的和合精神(团结统一)。

这样概括是否准确？是否只有这四条？是否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概括？都可以再思考、再研究。但是该丛书所概括的英勇果敢、宽厚善良、民族爱国、团结统一等四个方面，确实抓住了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多元融合的大文化。上下五千年，中华大地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除河洛文化外，还有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东吴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关东文化、闽台文化、西域文化、雪域高原文化等。但是，河洛文化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内容对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最基本的特征，还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进步、富强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今天，弘扬这种民族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文化研究是很复杂的，若想选好主题，把好方向、拿出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意义的成果来，谈何容易？因此，对“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究丛书”研究、探讨和编撰的专家学者们，应该表示敬意和谢意。

张国祚

绪 论

以“河图洛书”传说为早期肇始重要标志的河洛文化,是产生于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区域文化。而具有移民特征的客家文化,是具有浓郁中原文化底蕴并恒久保持至今的一种族群文化。这两种文化,从核心内涵上去认识,前者有其远古性,后者有其近一千年的后时代性,但二者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或个性,对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时,这两种文化又与中原、河洛区域文明的发展直接相关,并具有深层的渊源联系。

“河洛”,指黄河、洛水。河洛地区,指以黄河、洛水夹角地带为中心区域的地区,也就是狭义的中原中心区。历史上的“河洛”,既是地域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具有丰富深邃的人文内涵。司马迁《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司马光《过故洛阳城》诗中写道:“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萁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河洛地区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因此说,河洛文化,就是指历史上孕育、形成、发展于河洛中心区域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河洛地区位于中原之腹地,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从这里产生、发展而形成的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源头、核心和主流,对中华文明摇篮中原大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发端、统帅和辐射意义。可见,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而言之,河洛文化起源于史前,形成于夏商周,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宋。那么,从河洛文化的源头和主流地位去认识,至少到北宋灭亡之前,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经历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在各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扬弃,但毋庸置疑的是,各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都处在

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

“河图洛书”的传说,凝结着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智慧,并成为后世漫长历史时期哲学、儒学、医学、天文等思想理论学说的重要源泉,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影响作用。传说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在这个地区活动。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作为部族首领在这一地区形成了许多邦国,孕育、衍生出众多的姓氏家族,包括了后代主要中华姓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繁殖,农牧业、手工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使得河洛地区率先跨入奴隶制时代,产生了夏王朝。登封告成是夏都所在地。夏朝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之后的商、周都曾在这里建都。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历法和青铜铸造技术等,首先在这里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华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很多篇章即产生于河洛地区。周代确立以礼乐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地下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以及夏、商、周各代遗存,可谓星罗棋布。从众多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的相互印证中,人们可清晰看出早期中华文明在河洛地区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走向。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考察的古遗址,基本全在河南境内,并处于河洛核心区域。

秦统一后,尽管各区域文化的差异有所减弱,但中原地区的文化是延续不断、前后相接的,而且表现出更加强化、扩大和丰富的特征。儒学独尊后的汉代、政权更迭的魏晋南北朝之世、繁荣发展的唐宋时期等,无论文学、史学、宗教、科技、艺术等领域,加之后世地上地下的众多遗迹遗存,都无不彰显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光辉和活力。许多王朝纷纷在此建都,使河洛中原地区长期保持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洛阳、开封作为古都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不同时期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差异性一面,正说明中原文化发展经历了不断更新的过程,既把本身文化传播、渗透出去,又吸纳、凝聚周围文化,从而使得中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其领先地位。北宋灭亡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中原文化的繁荣程度和影响力随之减衰。但河洛文化、中原文化传统的主流和内核,也为以后各代所传承。

可见,从远古到北宋,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主流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一个连

绵不断的序列,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河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同化力,以及它的根源性、厚重性、融合性等,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宏与博大,是华夏民族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源泉。大量文献、考古材料,以及后世主体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表现特征,也足以向世人证明,河洛文化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形成和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同时另一方面,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河洛文化向外方区域的传播与发展,与人口的流离迁徙密切相关。从大范围来说,历史上自中原地区南下的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其文化上的传承和影响也最为突出,其中又以族群性的移民表现特征最为明显。

因此,河洛文化作为“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原外流人口群体中也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和极强的传承性,并使得河洛文化传统在移民聚居地区产生了久远深刻的影响。因此,河洛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历史移民问题密切相关,而中原以外各区域文化的发展及特征,又与历史移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南方闽、粤、台等地,常称历史上自北方或大陆地区迁徙过去的移民为“河洛人”或“河洛郎”,正是因为他们的祖籍地在中原,他们的先辈最初是从中原区域辗转南迁的。由于“河洛”曾长期是中原河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祖居地的标志性区域,是精神文化层次的象征,所以这些移民,甚至包括不少先祖来自北方其他地区的移民,都世世代代具有如此深刻而不可改变的“河洛”印记,这足以说明河洛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说到底乃是河洛文化的影响力。当然,由于历史久远,这些南迁移民先祖的成分非常复杂,能辗转迁徙到闽粤沿海及台岛地区定居生活下来的,已经历了无数代、漫长时期的繁衍和播迁。

关于中原外迁移民族群其文化传统的传播和影响问题,客家族群的南迁、定居和发展,无疑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征,对认识河洛根文化的作用问题具有其典型的意义。

客家文化,是在客家族群中一直保持下来并富有个性的文化传统。它既表现出早期河洛文化的内涵,又具有魏晋唐宋时期的中原世风。若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客家文化既表现出唐宋以前不同历史阶段中原文化的兼容性,又表现出北宋灭亡以前早期中原文化的原始性。

所谓“客家”,本是指客居他乡的家族,即相对于土著居民而言,这些家族是

从外地迁徙而来。王力《汉语音韵学》“客家话”引文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谱系，都足以证明。”“客家”最初不是自称，而是他称，是土著民对这一特殊族群的称法。“客家”或“客人”作为这一特殊族群的名称，大约在宋、元交替之际确定下来，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汉族民系。“客家”英文作“HAKKA”，是从客家人对“客家”二字的读音而来。故此，有人认为此读音源自“河洛”二字古音的音变，“客家人”即“河洛人”。还有人据此认为，客家称呼是由于客家人对自己祖先“夏家人”的崇拜观念而产生。

客家族群，是历史上自河洛、中原地区南迁聚居的移民及其后裔所组成的群体。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自中原地区南下的移民可谓不计其数，在南方地区，后世有大量居民或族群都是中原南迁移民的后裔，但显然不是所有南迁中原之民到南方定居后都成为客家人。客家族群是在一定时期内、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在所有移民群体中，客家人也最具特色和文化个性。

客家先民的主体，基本上是在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成批南迁的，但也基本上不是在一定时期内一次性迁徙到南方定居。中原先民南迁聚居并最终形成客家民系，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徙过程，也经历了无数磨难和开拓家园的艰辛。空旷贫瘠、人烟稀少的山区，成为这些逃难移民被迫选择的乐土。同时，当某一地区的移民数量急剧增多，或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移民又会再度转移。早期客家先民迁徙的主流，大致是首先集聚于长江以北的豫皖鄂交界地带，而后渡江，顺赣南、闽西、粤东的山岭地区迁徙，或分流到周边地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宋室南渡等，都是引起大范围迁徙的大事变。基于此，客家研究先行者罗香林曾提出五波迁移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Ellsworth Huntington)、英国传教士肯贝尔(George Campbell)等则提出三波迁移说等。

长时期地流转迁徙，使得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十分广泛。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依据调研资料认为，国内客家人主要聚居在粤、闽、赣、桂、川、台等地，并粗略统计出纯客住县有33个，非纯客住县144个。这里只是相对而言的大致划分，是后代经过无数次流离播迁之后所形成的基本分布格局。明清及近现代，大量客家人又迁居海外，遍布世界五大洲的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早期客家先民迁徙的情

况尽管十分复杂,但人们对客家先民根系中原、源自河洛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客家人的共识,客家民谣中说“要问客家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边”。

客家族群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系,正是因为这一族群南下后一直到今天,虽经历千年沧桑,却仍能始终顽强保持其移民群体的传统和文化个性,而不被其他族群所同化。这种传统和个性,正折射出其中原南迁先民的传统和个性,包括品德、理念、语言、风俗及精神文化等方面。而客家先民的传统和个性,则体现了河洛文化或大范围中原文化的传统与特色。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中说:“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家”,“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说明客家与河洛、中原在血缘、地缘上有着根系的连接,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有着根文化的渊源。

中原是中华众多姓氏家族的祖根地,客家家族也是如此,但仅从这方面不能说明客家的文化个性问题,因为大量根于中原的移民家族及其后裔并不是客家人。河洛根文化之所以能在客家民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世代传承,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一,中原家族人户自发性成批南迁,流向相对一致,聚居区大致类同。

第二,长期相对闭塞的群居生活环境。早先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后来成批迁移的外来之客而言,显然难以安居和发展。如长江中下游两岸,以及江浙等其他历史上比较富庶的地区,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却很少有客家村落。即使在移民辗转迁徙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可能会融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也会被同化而逐渐失去其原本的个性。因而,客家南迁定居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相对封闭、落后、人烟稀少的山岭地带,如最先集中聚居于赣南、闽西、粤东等地,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长期封闭聚居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的语言、习俗等能够世代传承下来,或者说其主体成分一直保持着固有的传统。如颇具特色的客家方言,其常用词语被认为是古代所谓的“雅言”,体现出中原古音或古代以中原方言为基础的官方语言特色。

第三,保持其浓重的先民本色。从河洛文明的起源,到夏商周统治的中心区域,再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北宋时代,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直是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甚至这一区域文化成为官文化的代表,而带动和影响着其他的地域文化。而晋末丧乱之后大批南下的中原移民,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文化特质,他们原本又多是中原的贵胄之家、衣冠

之族。因此,这些移民及其后裔,无论迁居何地,都十分注重继承先祖传统,维护祖上盛名,保持先辈本色,对先民的传统有很强的固守观念和意识。如祭祖、重家、立祠、祭祖、修谱等,凡客家地区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在观念意识上他们也都以中原汉文化的传承者而自居,这正是客家人历经千余年、播及海内外而仍具鲜明个性的重要原因。如语言是人文特征最重要标志之一,客家人即把自己的母语称为“祖公话”,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肯舍弃,充分体现这一族群浓重的先祖文化情结。

第四,重教的文化传统。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突出的文化传统之一,这些家族为保持“衣冠”之裔的本色,无愧于先祖,无论在什么艰苦条件下,都要把教育后代知书习礼放在最为优先的地位,同时还要力耕而维持生计,所谓“耕读为本”。由于男子多出外闯天下,妇女便担当起治家育后的重任。这是客家地区十分普遍而恪守不变的族群理念。因此,在各个时代,客家族群中都涌现出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这也是客家人之所以能够世代继承、发展先民文化传统的重要支撑。

虽然我们不否认客家特性中不同程度地汲取了迁居地文化的因素,但从整体特征来认识,客家族群的形成,的确与中原移民自发性成批南迁有着直接的关系。客家文化的个性,的确与河洛文化、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渊源联系。客家人根于中原,客家文化源自河洛。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在中国、在海外各地的广泛影响,折射出河洛文化、民族根文化源远流长的生机和活力。

编者

2010年6月

目 录

丛书总序之一·····	李学勤	1
丛书总序之二·····	张国祚	4
绪论·····		1
第一章 河洛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发展·····		1
第一节 滥觞期的河洛文化·····		1
一、河洛文化的考古探寻·····		2
二、河洛地区文化与周邻文化的关系·····		13
第二节 形成期的河洛文化·····		22
一、夏商周时期河洛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		22
二、河洛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		27
三、河洛区域文化的发展轨迹及相互交流·····		32
四、河洛文化的初步形成·····		34
第三节 丕兴期的河洛文化·····		38
一、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		38
二、河洛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		43
三、河洛文化的传播·····		52
四、河洛文化的前代继承与发展·····		55
第四节 鼎盛期的河洛文化·····		61
一、隋唐宋时期的中原政治形势·····		61